City Talks
「城市變遷與文學之路」
座談會

主持：鄭培凱教授，吳宏一教授

嘉賓：董橋先生、毛尖女士、章詒和女士、劉紹銘教授、張大春先生、白先勇教授、鄭愁予先生、陳義芝先生、葉輝先生、痙弦先生、鍾玲教授

「城市變遷與文學之路」座談會發言嘉賓陣容鼎盛

凱：今年很高興得到何鴻毅家族基金的支持，請來這麼多的作家。另外，還有香港藝發局、澳門基金會的支持使得城市文學節的徵文和頒獎的工作可以順利進行，我想今天這麼多作家聚首在這裏，最主要是跟大家談一談他們創作的心得，特別環繞着「城市變遷與文學之路」的主題，其實就是對於香港、澳門這些青年、寫作非常有興趣的青年給一些提示或者是啟發。接下

鄭培凱教授（主持）

來我想這個場面就交予吳宏一教授，我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吳：恭敬不如從命。不過，一場座談會安排兩個主持也是件罕見的事。那麼，第一個講話的主持一定是主打，第二個講話的是代打。那麼代打萬一講得不得體，或有言不及義的地方，我請鄭教授隨時可以把這個主持的棒子搶回去。

在座的應該都是文學的愛好者，或許有人會以為文學有甚麼了不起，在文學的三大類，散文、小說、詩歌的作品中，有人這麼說過，所以這都沒甚麼了不起。散文家往往不過是把假的寫成真的，小說家往往把真的寫成假的，那麼詩人往往是把很簡單的一句話就分成好幾行，而且寫得不明不白。那麼話是這樣說，但是，有成就的作家學者是不一樣的，今天在台上的，這些著名的作家學者，他們所寫的作品，我想起碼對我個人來說，讀了以後感受就不一樣。因為他們有感染力，而且他們寫的作品在我們讀了之後，也不會去計較他是真的假的，或者有沒有分行，是不是散文的分行。《紅樓夢》說的：「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

吳宏一教授（主持）

處有還無。」其實，真真假假在文學裏頭是沒有關係的，文學的真假是不一樣的。那麼，今天我們請了這些專家學者，在他們的作品中，大概如《論語》裏頭講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我想我們在喜好之外，都陶醉在裏面。陶醉以後不會去分辨的，所以他們一定有他們的成就，一般人所不及的地方，我們今天就有這個機會請他們來夫子自道，那麼我想就按照這個座位的順序，我想主辦單位也是有安排，就從左邊依序介紹。

第一位，最左邊三位都是散文組的，第一位是董橋先生，董橋先生現在是《蘋果日報》的社長，他的散文的成就用不着我多說，我想他的粉絲很多，也包含我在內，那麼香港、台灣、大陸，還有世界華人都有他忠實的讀者，我想對他就不加介紹了，現在就請董橋就大會所設的主題發表他的高見，請董先生。

董：文學只能寫，不能講，所以我就沒有甚麼好說的了，通常都是人家問我，我才說。問一句就答一句，今天很不幸輪到我先說，我就不說了，就讓給毛尖和章詒

和先說。你叫我寫，寫多少字都沒問題，但講的就不提了吧！

毛：我肯定不敢講的，因為我左邊坐的是董老師，右邊坐的是章老師，已經很受不了了，因為大家可能有很多話問章老師，要章老師講，所以我就把時間交給章老師。

董橋先生

毛尖女士

吳：我要插幾句，應用主持的權利，董橋先生說他只會寫不會說，可是去年一開口的話，就滔滔不絕，不能自休，講了將近兩個鐘頭，是不是打算留在下午說？

董：下午再說吧。

吳：假設董橋先生不是真的惜口如金的話，那麼我們就請第二位毛尖女士。毛尖，她的筆名呀，我們一睹就想到朱自清《匆匆》的文章，剛剛張信剛校長就引用過朱自清《匆匆》的句子。其實毛尖女士，還有一本書

叫《慢慢微笑》，她一切都是慢慢的，不像朱自清那樣的匆匆，朱自清寫春天的雨，說春天的雨像牛毛，像花針，花針當然是尖的，所以毛尖大概跟朱自清的詩文是有關係的。毛尖有一本書非常暢銷，我也是愛讀者，這本書是介紹文學與電影，叫《非常美非常罪》，它的罪是罪過的罪，不過可以把那個罪過的「罪」改成陶醉的「醉」，我讀了以後非常「醉」，非常美。現在就請毛尖女士慢慢微笑，慢慢說。

毛：吳老師，前面已經說了。其實，我還是像董橋老師說的，下午再講，好嗎？在上面講挺可怕的，我們請章老師講，好不好？

吳：這個寫散文的人，很奇怪，本來我剛剛才講，把這個真的寫成假的，把假的寫成真的，那麼他們每個人都要留到後面說，那麼我想，不管怎樣，我們就先請一陣風，留下千古絕唱。那麼請章詒和女士來對我們講她的創作經驗，當然這個要針對主題。章女士最近真的像一陣風，引起了不止文壇，還有很多傳媒各方面的重視。章女士雖然只有寫過幾本書，而且寫的不過是伶人往事，但是寫這些最後的貴族，卻引起廣大讀者的喜愛。我也是從李金銓教授那邊才知道有這本書，讀了以後我也非常佩服，覺得文章像行雲流水，可是後來曉得她各種狀況以後，我昨天晚上跟她講，她的文章和她的人，我可以用古人兩個字來形容她應該很貼切，叫「風骨」，就是讀書人的風骨，那麼現

在就請章詒和女士來發表她的高見，千萬別再推辭了，再推辭的話，散文就不像散文了。

掩飾自己與沉溺自我

章詒和女士

章：先說兩句散文，無論是詠史、詠物，還是詠懷，都是作者用第一人稱借主人公口吻抒發內心的思想情感而形成的一種文體。這不是說，散文就只能是思想感情的抒發，沒有像敘事文學那樣的對客觀事物的描寫。它也寫人、寫事，它也寫物，但其目的是為了抒情。所以，散文的一個很大的特點，它的情節並不是那麼完整，文中的人，也不是那麼充份。這一點就像俄國的別林斯基所言：「作品看起來彷彿是一幅畫，但主要之點並不在畫，而在於那幅畫在我們心中所引起的感情。」很多散文寫的是一種心境、情緒、狀態，如快樂、孤獨、無奈，你的愁腸，或你的失落。所以散文常常無法掩飾自己，它呈現的是一個活生生的自我。

中國文學史上，散文有三大時期比較發達，分別是春

秋、魏晉、民國。雖然四九年以後，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非常之偉大，但是散文並不發達。現在由於報業和網絡的發達，所以散文的發表量化，同時也是泛化，其危險就是消滅個性。我個人以為。一個人的精神生命的質量，決定散文創作的品格，這是第一點。第二，好散文，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往往帶有個性特徵，這是非常重要的。否則就會平淡、平庸、平常。但與此同時，你這種個性特徵必須要有不同程度的普遍性。也就是說，你的這個個性化的感受和情感，在某種條件下，也能喚起一般人的理解、感動、同情、共鳴。否則，你一個勁兒的抒發個人哀愁苦樂，人家會說：「你的那個痛苦，我們不懂，又與我何干？」你翻翻《古文觀止》，那都是數百年前文人的感受，包括韓柳歐蘇在內，幾乎絕大部份文章，都是作者在有社會障礙下寫的。現在讀着都激動，每一次看〈報任安書〉，再想起父親的一遍遍的吟誦，我的眼睛是濕的。那種情景，那種司馬遷內心的許多痛苦，許多看法都在裏頭。你要引起共鳴，我覺得是古今相通的。第三個就是，文學絕對是個人的事情！和所有的組織、單位、黨派無關，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可能是我今天講的一個重點。因為我在一個特殊的背景下，由於是極其個人化的，又不能選擇，所以它一定和主潮、主流是不一樣的。想把散文納入主旋律，我覺得是枉費心機。它和整個文學的本質，特別是散文，幾

乎不能兼容。如果你和主潮、主流距離太遠，它就不見於任何報章刊物，無渠道發表，無渠道流通，幸好我們現在還有網絡。非常有成就的學者、大家、批評家出於各種原因，是不會站出來的，不會替這種不能發表的東西去講話的，也不屑於評價這樣的作品。

文化壓制與文化突破

最近的例子就非常顯而易見，查禁了很多書，作家協會誰站出來了？中國作家協會，從主席到他的成員私下裏都跟我說：「詒和，我們非常支持你，你站出來，我們就跟在後面。」我說：「你跟在我後面幹麼？是不是你也跟我站出來？」這是他們有種種顧慮。

因此，北大的一個教授說：「中國的文學創造是才智和毅力的角逐。」才智我就不講了，他為甚麼要談毅力的角逐呢？何謂毅力？就是說你要經得起被指責、被壓制、被封殺、被查禁、被冷落。好的東西遲早會冒出來，會感動和影響我們。前提是文要好文、書要好書、貨要好貨，早晚會出來。當然，從功利的角度、從名利上來講，當然出名要趁早，早出來，晚出來情況不一樣。你會失去很多，大家都知道大陸很多作家是蠻有錢的，比香港的有錢多了，一本書還沒有印就能拿到三百萬，這只有大陸作家才能做到。我覺得香港出版商沒有一個會這麼傻，所以，你必須是好

東西。我的看法，文化的壓制只有靠文化去突破，絕對是這樣的。那麼從剛才所講的，名利的角度你會喪失很多。但是，從文學史上，就不是這樣。

文學史上流出來的東西，它不在於時間的早晚。因此，其實文學是個無情的領域，這裏的殺戮也如商戰，不過它是智力和精神上的決死而已，就看你是否能堅持到底。謝謝。

吳：謝謝章教授，等一下有時間的話，我們還可以請毛尖女士發表她非常尖，非常心，慢慢微笑的談話。那麼，董橋先生，假設願意的話，等一下還有時間可以補充。底下我們要介紹的是劉紹銘教授，劉教授是我的大學學長，很早以前，我就拜讀他《吃馬鈴薯的日子》，後來讀他寫的《二殘遊記》，讀過他翻譯的馬拉美的一些著作，可是我最佩服他的還不止是他寫的雜文或其他。我最佩服他的是來香港嶺南大學辦中文系，所規劃的課程在我看是中外古今兼備，我認為是規劃最好的中文系課程，所以我覺得劉教授，對我們今天主題一定有很多寶貴意見，他是我學長，我不敢開他玩笑，所以現在就請劉教授。

「怎麼寫」的文學訓練

劉：謝謝吳宏一教授的美言，聽到他對我講的話，覺得這輩子好像沒有白活了，他不能開我玩笑，我開他玩

劉紹銘教授

笑。張信剛校長領導之下的城市大學對我們外賓很好，有吃有喝，可是我們外賓有時候是被欺負的。為甚麼這樣說呢？你看看，從董橋那邊看，和鍾玲那邊看，然後看看吳宏一教授跟鄭培凱教授，他們都是教授，我們是先生，對不對？那個鍾玲女士呀！是浸會大學的院長，那院長對我來說，是一官半職，是吧！所以也該寫上去的，對鍾院長好像說欠缺，有一點那個味道，不，開玩笑而已。這個，沒想到鄭培凱教授叫我做評審，還要講話，真是辛苦。所以早上還沒睡好，對不起，胡言亂語。現在，散文，我不曉得我寫的像不像散文，我在董橋社長領導下的《蘋果日報》寫〈星期天不休息〉，就是寫了一篇散文，我不知道。不過，據我所知，我們教文學的寫作班，就兩個字就可以全部講出來，現在訓練人家寫作不是What，寫甚麼毫無問題，香港也好，全世界也好，那個八卦題材太多了。今天跟你吃個飯可以寫一篇文章，那個是What，可是How，怎樣寫，那個是最要緊的訓練。訓練就是語言各方面，怎樣把一個平平凡凡的事，就是說那個，周作人所講的草木蟲魚都是寫的對象，可

是你又不懂得 How 怎麼寫的話，你就不會寫的，所以長話短說，旁邊的張大春，大家都曉得，所以讓他講好了。

凱：我剛才聽到劉紹銘講的笑話非常有意思，我就想到以前讀書的時候，在美國東部很老的學校。在那學校裏面，假如你稱那些先生們，你稱他教授，特別稱他博士的時候，他非常的不高興，你定要稱他 Mr.或者 Mrs.或者 Miss，我就想起來，老派人很有意思。和我們現在新派的很不一樣，我們新派的喜歡把頭銜放上去，老派人，就是最平實的那個稱呼，就是最尊貴的稱呼，先生我想是那個意思，應該是最高的。可是我想，我們學校的同事們都很年輕，所以對於我們兩個人就給安上了現代的這種稱呼，就假設我們兩個人是不會創作的。真正會創作的都是先生女士，所以剛才聽了劉教授講了以後就想起來了。不過我們下面就請張大春給我們講故事，張大春非常會講故事，因為會寫散文，又會寫評論，特別會寫小說。我不曉得等一會兒他講的是告訴我們真的故事，還是他臨時就可以編出一個故事。他告訴你這個創作的經驗，大家要小心點，說不定他講的是個故事。不過，這講的真真假假，即使他講的或編的故事，對我們喜歡創作的人是有啟發的。我們現在請張大春先生。

文學的遠景

張大春先生

張：我剛才坐在這個位子聽，我不知道坐在前面聽的感受如何。這裏回音比較大，而且發音如果子音比較多，像 zh, ch, sh, r, z, c, s，這耳朵一定不舒服，是吧？所以我看是不是能夠在我的發言裏面，盡量少用 zh, ch, sh 或 z, c, s。可是一開始麻煩就來了，因為城市這兩個字，我們今天的題目，它就是 zh, ch, sh。「城市變遷與文學之路」看起來是一個題目，所以我按着題目講最保險。

看起來只有在城市裏，變遷才比較明顯，為甚麼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這些地方比較看不到大的變化或者是急劇的變化，不管是生活工具、學習工具或者是知識工具，大概不容易產生根本上的變革。可是從去年我來到這裏，也就是「城市文學節」從「城大文學節」改名到「城市文學節」的第一屆，到現在差不多一年，這一年之中我就發現變化非常之大。甚麼變化呢？先說我的同行，在北京的王朔，他突然在今年，也就是過去的三百六十五天之中

做了一個奇特的宣佈，他再也不讓出版商賺他一毛錢，他所有的文章都要在網路上發表，收費。而且直接跟要讀他作品的人取款，也就是說作家開始意識到他和他的讀者之間的溝通是不需要大盤商、中盤商、總經銷，而且是不需要出版社，也許還不太需要編輯。這文學作品，我突然在我的過去這一年裏，為他想到了一個極大轉變性的命運大概已經來到了眼前，甚至來到了腳下。假如沒有人再替作家出書了，我第一個想到，我的生活就完蛋了，因為我太太是個編輯，她要失業的。她要失了業我得寫兩個以上的東西，可是倒過來講，作家直接透過工具的改革，跟他的讀者互動或者溝通，可能在未來會碰到另一個問題，作家不受制於編輯，不受制於媒體，他會直接成為讀者的人質。而且我樂於看到這樣的情形，作家在過去，不管他被稱為博士、教授或先生等各種稱呼，都看起來比讀者位階高一點，當王朔公開宣佈不讓出版社賺一毛錢的時候，我第一個看到的文學之路上的遠景，是作家必須去被他的讀者更進一步的入侵，所以不論是「蓬萊文章建安骨」，可能在未來都要接受徹底的改變，也許多年以後我們回頭看2007年我們談這個問題的時候，發現我們已經越過了分水嶺，或者起碼正在分水嶺上。城市的變遷意味着在城市裏從事寫作工作的人，哪怕人居住在鄉村，如果他使用城市工具，他也一樣算是城市人。不管身在何處，使用現

代媒介跟工具從事寫作的人，再也可能沒有散文、詩跟小說的分別，恐怕都已經在革命裏面。

去年到今年我個人的變遷也就是作為一個寫作者，我也順便能夠報告一下，我記得去年，我在同一層樓的另外一個講廳，我作了一個小小的宣佈，我說我大概意識到我離小說越來越遠，也許在我眼前，手上必須去完成的一些長篇作品，有第一集沒有第二集，有上沒有下，得把他料理完。料理完了之後大概我就不會再寫小說。而過去這一年裏面，我寫古典詩，堪稱寫得不少，我寫了一千兩百首，我的家人都知道這一千兩百首大概只有兩首賣了錢，而且這兩首是賣到香港的錢。在今年春節，我感謝《明報》馬家輝博士登了我兩首詩，我非常感激他。突然發現老古董也可以成為商品，是非常令人驚喜的事。可是我自己，為甚麼說的把這個自己的經歷在過去的一年中，作為拿來報告呢？我覺得過去我的生命之中的四十八、九年間，沒有像去年這一年做得那麼多，那麼大量的，非常基本的學習。我寫的每一個字，所運用的每一個詞彙，它的來歷，它的典故，它的變化，或者歷朝歷代使用的這個詞，使用這個字所做的種種的這個薰染，或者是附會，都要把它弄清楚。

所以，一首詩四十個字，五十六個字，哪怕更多，少的二十八個字，二十個字，每一個字的個別的認識，重新的認識，使得我感覺越活越回去了，像小學生一

樣。我非常感謝在過去那麼多年來，有許多認識我的人，讀我的書的人，支持我成為一個看起來還蠻像樣的作者，因為我一直不斷的在寫，也維持着我的生活。可是我更感謝的是，我透過了我的寫作，到了去年到今年之中，這個重大的轉變，使我有機會向大家說，我也許可能會變成一個詩人呀！謝謝各位。

吳：張大春先生其實不只寫小說，也寫有關小說的理論，像《小說稗類》。

不但能寫而且能講，所以他在台灣的 News 98 的節目也有很多聽眾，很喜歡他的節目，而且我個人還知道他能罵，就罵官員，罵人都罵得淋漓盡致，罵得很好。那麼他剛講的，他最近寫舊詩詞，跟我一個好朋友原來就是張夢溪先生常常一同發表，那我覺得他進步很快。在座有很多是我敬佩的、佩服的前輩、學長，也有一些是我刮目相看的後起之秀，像張大春先生就是我一直很佩服的後起之秀，他從第一篇或者是最早期的《雞翎圖》開始，我就看過，他從《雞翎圖》到《將軍碑》、《四喜憂國》或者到《少年大頭春》等等，我都看到他作品的演變，他剛講的是他寫作的一些歷程。去年，他來參加我們的城市文學節，就跟我講，他說我以前見到他都只是問他為甚麼不去考博士，因為拿了碩士，他常常說我問他以前為甚麼不考博士，那去年我沒回答，現在回答你。因為，張大春先生雖然沒有拿博士，但是，他寫的小說已經是碩

士、博士論文研究的對象，所以唸不唸博士都沒有關係，這可以間接回答我的學長劉教授所說的，就先生教授沒有甚麼差別的，我們劉教授研究的東西很多都是先生小姐的著作，這裏沒有甚麼高下之分的。

底下應該稱學長，就是白先勇先生，可是我想他看起來很年輕，而且他的粉絲真多。所以我昨天晚上已經向他預告了，所以今天我要開他兩個玩笑，但是一定讓他很窩心的玩笑，以前很多次，白先勇見到我都說「謝謝吳宏一你以前替我們的《現代文學》寫稿子」，我都沒回答，為甚麼呢？因為他從來都沒有給我稿費。不過，這都是開玩笑，我還是很感謝。因為他當時能在《現代文學》發表文章可能應該付給他們稿費才能登，因為對我們來講，當時是一個鼓勵，很榮耀。第二個，2005年10月，剛剛何氏基金會講他們資助白先勇先生帶崑曲到國內，還有很多地方去公演，可能那一次就是白先生去跟天津南開大學接待的事，我正好為我的老師葉嘉瑩教授慶祝八十壽慶，所以我到了南開大學，他們安排我住在一個學校旁邊的賓館裏頭，我也聽說白先生正好去，連我的老師都去參加白先生的宴會，不招待我，那我就住在賓館裏頭。有一天下午，我睡完覺下來的時候，一下電梯，那個大廳裏頭就有好幾個青年男女包圍在我的前面，我就覺得很訝異，其中一個長得高高，不錯的年青人就拿着筆，拿着一本筆記簿，就上前來，說要請我簽名，我

當時想，我甚麼時候變成明星呀？還有人要我簽名，所以我問：「你為甚麼要我簽名呢？」這位年青人說：「我很敬仰你，所以要請你簽名，我看過你很多的小說。」我說：「你看過我甚麼小說呀？」他說：「《遊園驚夢》呀。」我說：「你曉得我姓甚麼嗎？」他說：「你姓白。」我說：「我不是姓白，我姓吳，你要找的白先勇先生我認識，但不是我。」所以我就沒簽了。好，現在我們就請白先勇先生。

值得寫的故事

白：先要向吳宏一教授再謝一次，你免費替我們寫稿，那時候我們在辦《現代文學》的時候，我們連這個，不要說稿費，編輯費甚麼費都沒有。劉紹銘與我們一起在編，他寫我們那個創刊辭，當然沒有錢。我們那個時候窮到連校稿的時候就騎個腳踏車到印刷廠去，印刷廠說：「你們要印多少本？」我說：「一千本。」「一千本？擱在那裏吧。」那我就說：「好呀。」那我就等，等等等，等

白先勇教授

到晚上明天再走，你不印的話我就不走，我守在那個印刷廠裏頭，所以他印一張出來我就校一張。那個時候完全是手工業式的年代，排版都是用手去排的，排得真快，不輸於現在的電腦，嘟嘟嘟嘟這樣排着。所以那個油印的氣味很懷念，那個油印的味道，書香味，是不是？我們在台灣那個年代，現在吳宏一提了起來讓我又掉了過去，他的文字老是讓我懷舊，我也是常常覺得新不如舊，所以我電腦不行，我一打就全部錯掉了。那個時候，實在是給不起稿費，我給不起稿費，反而有很多很多重要的稿子在《現代文學》上面發表了，有很多一直到今天，那些小說、詩、散文，還是常常加入選本的。在座的很多都在我們雜誌上發表過，而且都選了本，所以吳宏一你沒有白替我們寫的。至於剛剛講的南開大學，因為我們去演過青春版《牡丹亭》是免費，也是何鴻毅家族基金支持我們校園巡迴，我覺得現在中國大陸最需要的教育就是我們傳統文化的美給他們看看。過去很美嘛！南開的確人文氣息很濃，可是我沒想到天津，這裏有個戲曲專家，章詒和女士她是戲曲專家，我想請教一下，為甚麼當年名角兒在北京唱不算數？一定要到天津去，唱了，天津人點了頭才算數？

章：到天津是受認可，到上海是發財。

白：那天津是不是戲曲？

章：絕對是行家。

白：可是我們去演戲的時候，天津人看戲可是會看的，我們帶戲的時候有一點點心虛的。沒想到南開瘋掉了，我們去演出的時候，一千三百個座位擁進去一千六百個學生，外面還站着幾百個學生。後來校長要叫警衛，警衛不夠，就一字排開把他們擋住，然後學生往裏面衝，快要造成事件了，所以演得很熱鬧。我想是因為這樣，學生就開始知道我了。我想吳宏一大概都是外面去的，反正都以為去這麼多的都是作家，總是要簽名。

凱：他們讀過你的書，沒見過你的面。

白：我有些讀者去捧場的，看那個戲，所以南開有這個事情。

現在言歸正傳，講城市跟文學。剛才大春也提過了，講了兩者的關係。那麼我自己的確是目睹或者參與香港的變遷，因為我是1950年到香港的，在香港住了三年，我想我們中國歷史上最大一次變遷，中國最大的一次人類史的天翻地覆，我那個時候小，甚麼都不知道，坐了一個船，睡醒起來就到香港了。沒想到那段路過來的變遷之大是天翻地覆的一次，我想我自己參加了。最後幾乎一、兩年我都會到香港來的，因為香港有親戚，而且在香港也住了那麼久，有一種感情。我在香港唸小學逼着講廣東話，所以也能講幾句，香港挺親切的。我常常回來香港，當然另外很重要的是香港的東西最好吃，為了這個也要來吃一下。香港應

該是最好的地方，你想想看，這個城是全世界密度最濃的吧？最大的吧？好像是，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好像是人口六百多萬人。

凱：七百萬人了。

白：七百萬人啦？你想想看，香港這麼小的地方住那麼多人，那麼複雜的。有多多少少可以構成的故事，人與人的故事就多了，因為磨擦多了，競爭也大了，各種的關係都密切了。如果像別的地方，恐怕故事不多，是不會太多。香港每天的故事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一直在期望香港故事、香港小說，我想一定會在中國小說史上佔一席之地，這幾年我也常回來參加香港的文學活動，我想內心中對香港有一份期望、希望，也期望香港這種文學的新起，香港小說，不同於中國大陸或台灣，它非常獨特的地方，它獨特的文化，以這個先天條件來寫小說是太多故事了。從50年代之前，張愛玲寫過了，他們都寫過了。50年以後也有變遷非常大的故事可以寫，所以我衷心的期望香港會寫出我們刮目相看的一些小說來。

這幾次，我在香港參加過差不多六七次小說比賽。其實，說真話，參與之中很辛苦的，我今天早上八點四十分就要集合了，我是爬不起來的，我是夜貓子。但是，我覺得這個意義重大，尤其是一些中學生、大學生的。以前我也參加過一些小說評審，現在不參加了，反而中學生的，我覺得要緊了，這台灣也是。中

學生的文學活動會參加的，因為我也是從中學寫起，所以中學培養是很重要的，所以這次文學的意義，中學、大學的青年們，我們也是那個時候開始的，所以我覺得很深的一個期望就是現在香港有很好的條件，我們就是要多去關注，給機會去發表、出版，這些文學的配套是需要的。我想本身這個條件已經有了，周邊鼓勵的條件增加的話，我相信香港的文學會更繁榮起來。

吳：謝謝白先勇先生。幾年前，他對香港的文學就有很多的期盼，很多的鼓勵。我想香港愛好文學的青年可能自己也要奮起，好好的創作。白先勇先生前幾年就講過城市的變遷，他剛才所講的都涉及到城市變遷跟文學之路，那時候他拿三個城市做比較，就是上海、香港、台北。各位有沒有發現，在台上來的，再加上一個北京，就是北京、上海、台北、香港都全部在這兒。實際上，我們的城市變遷，假設來自四個不同地區、四個不同城市的人能說一說自己的一些情況是更好的。萬一，等一下時間不夠的話，我希望有記者可以往這方面採訪，或者我們學校的編輯也可以向這方面採訪。我印象中白先勇先生以前談三個城市的變遷，《明報月刊》後來是登的，我希望這一次有這麼多來的專家學者加上一個北京，看看這幾年來的變遷，特別是上海和北京變遷是很大的，香港和台北也是很大，只是有的是經濟上，有的是政治上的變遷而已，文學也是大家可以關心的課題。

底下不介紹第一個主席，因為他也寫詩，可是今天他沒份。我底下要介紹也是我的老朋友，也算學長，鄭愁予先生。我昨天有沒有預告你，要開你一個玩笑。就鄭先生，剛剛校長也講：「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其實在座很多的讀者讀鄭愁予的詩也常常犯了美麗的錯誤。為甚麼呢？鄭愁予的詩，抒情的味道很濃厚，所以贏得許多讀者的喜愛，但是很多人以為鄭愁予先生寫的詩那麼浪漫，他的人很浪漫。他的人是很浪漫，但是我的理解是他一點也不浪漫。誰最知道？他的太太最知道，鄭太太隨時都是跟他同進同出，去到哪裏跟到哪裏，所以他生活絕對不浪漫，夫妻非常恩愛，生活非常嚴肅，絕對沒有浪漫的一面。我想底下就請鄭愁予先生發表他的高見。

城市是文化中心

鄭：謝謝宏一大師，可惜他沒有出家，要出家才是一個大浪漫。剛才談到的課題是「城市的變遷」，剛才張信剛校長演講提到

鄭愁予先生

了，過去他演講的時候有一個稱譽是他出口成章，口才非常好，今天竟然出口成詩，這是一個很大的變遷。

所謂城市，在我看來就是一個文化中心，如果有幾個城市距離得很近，一個城市的文化足以能夠傲視其他的城市，那麼這個城市就是中心，其他就是交樞，那不是邊緣就是交樞了。城市文學節每年都是和澳門合辦，一般看來好像澳門在文化上是香港的交樞，不是說人口，人口深圳可能比香港多，但是她絕對是香港的交樞。不過，這也要注意，澳門開始力爭上游，她有許多文化的活動。我們去看澳門的藝術展覽，每次都覺得這是世界級的文化活動，所以香港要極力地推展自己的文化，要不然就成為澳門的交樞了，我這是開玩笑的話。這個城市的文化很容易見到的是一種表象的，像她的建築物，交通狀況等也有許多的內涵，這個內涵的文化常常跟她的傳統有關係，像澳門就有比較老的傳統。這個傳統的文化和現代的文化有時候會有抵觸，抵觸的過程就會產生變遷，現在的變遷並不是說有意的變遷，有時候受西方的影響多了，就把傳統的部份減少了，有時候要有種自覺，假如我們沒有這種傳統，我們的文化就成不了中心，所以歸根究底就是一句話，要有一個文化的特點和風格。這個文化包括都市文化、時裝文化，像我們在街上走所看到行人穿的衣服，這也是表現一個文化。我到香港也常

常注意，特別是士女們的穿著打扮，可以看得出是有變遷，還有流行的音樂。有一個笑話，有一次在巴黎的地鐵上，兩個巴黎人坐在上面，上來了一位先生，咀裏面哼着一個歌，好像剛剛學會的在唱，坐在旁邊。這兩個巴黎人就說：「嘿，這個人是從布魯塞爾來的。」是甚麼意思呢？這個歌巴黎已經流行兩個禮拜了，布魯塞爾才開始流行，所以從布魯塞爾來的人才哼這個歌，可是布魯塞爾比起盧森堡，她是中心盧森堡是交樞，那麼布魯塞爾是巴黎的交樞，所以從這個可以看得出文化是造就了一個城市的中心。城市的文化要有她的特點的話就要靠文學，比如說住在一個都市裏，我們看到這個都市的特點。有些特點，有些我們不滿意的、失意的，它可能是一般的都市的缺點，但是他的美常常是一個都市特有的美。我在香港就寫了道路交通，我發現他的美不是大家開車的那一種繁鬧，我發現這個道路的轉彎道可以用來寫詩，非常有意思，我發現這個是建築之美。香港的建築物因為山的關係而面向四方，而且很容易就可以在車上看到他的全貌。因為你轉過去就可以見到他的側面，這個是世界上大都市沒有的特點，我也寫成詩。特別是香港的招牌，跟所有華人居住的地方都相同。台北的，我就覺得難看，有的時候太誇張，色彩太不調和，很難看。香港呢？你在九龍或美國也是一樣，後來我才慢慢發現他的好處。在曼谷的也是這樣子，那

我寫詩原來是在台北寫的，到了香港我就把它改了，改了幾個名詞，那麼我讀一讀這首詩。我的意思是說，作為一個寫詩的人在一個都市裏發現它文化的特點、它的優點、它的好處來寫，如果是抱怨，現在台北有一陣子所謂流行的都市詩。像去逝得可惜的林燿德，像現代羅門也在寫，很多是抱怨的，因為都市生活和他的性格不相合，可是如果真的喜歡自然，那就到自然去寫山水詩、寫田園詩，甚至於坐在書齋裏也可以寫。如果寫都市，我選擇寫它的美，寫它的好處。

我讀這首詩：〈中環街頭就像我的書架〉，原來我寫的是台北街頭，我把它改換了，因為它們美的特點是一樣的，「欲藏國典，所以洋裝，彩雲樹標的大字蹦上跳下，中環街頭就像我的書架。我愛看我的書架，雖花亂而頗有內容，就像我來香港漫步，身獨試招猶勝自己的新作，而駐足餐館廊下，品味窗上的酒皿菜式，就像呆學生的無助，唉，美食怎能遍嚐？好書安得盡讀？中環沿街過淑女，就像書的邊緣上，匆匆作者的名字，情緣情緣，君子一瞥，卻引發無盡之遐思。」這個香港女性有她們的一種美，她們穿著打扮匆匆地、忙忙地，但是不是優雅，這也是我作為寫詩的人所需要表達的。謝謝各位。

吳：謝謝鄭教授，剛剛我話多了，每個人都開玩笑或多誇張的時候，鄭培凱教授就跟我講要給主講者多一點時

間，我看到校長夫人不停地點頭，就表示我話多了，所以我現在從善如流。鄭教授，其實我是他忠實的讀者，我初中的時候就在高雄中學圖書館讀他的《夢土上》，後來他很多的作品像《寂寞的人坐着看花》，到後來很多作品，我都是他的愛讀者，我剛才跟他開玩笑都是善意的，而且我保證他一定不生氣，他太太一定高興。

底下我要介紹的是陳義芝先生，可能香港的讀者對他不太熟悉，其實他和張大春先生都是中文系畢業的，可是各位可以看出這是兩個不同的典型，一個是比較有點狂放不拘，一個是溫文爾雅的，各有各的好處。陳義芝先生跟瘂弦先生是前後《聯合報》副刊的主編。我記得瘂弦先生講過副刊，特別在台灣，《聯合報》副刊和《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這兩個副刊是培養很多的寫作人才的。很多人都是在這邊發表後才走上文學之路，瘂弦先生說聯副就像辦一個大學中文系，所以實際上他們手中都辦了很久的中文系，培養了很多人才。陳義芝先生不但詩寫得好，比如說早年像《青山》、《新婚別》等等都寫得好，而且最近我看他的散文〈期待另一次的相逢〉寫他喪子去逝的哀痛，還有寫他老師，我的朋友張子良先生的文章，我看了很感動，要是早幾年我一定掉眼淚，我現在年紀慢慢大了，比較不會被感動，比較不會掉眼淚，納蘭詞說人多情，「情到多時情轉薄」，我現在是情轉薄的時候，

所以雖然很感動，但沒有掉眼淚。但我還是非常的佩服，我不曉得寫詩的人，散文左手右手寫文章，散文寫得這麼好，這麼感動人，我想現在就請陳義芝先生發表他的高見。

文學創造心靈居所

陳：謝謝吳宏一老師，我想今天的題目在香港談是非常適合，香港作為一個世界著名的城市，作為城市來談文學，對從台北來的人我是印象相當深刻，因為台北要來談這種文學，大概是二十年前才會有今天此刻此地這樣的盛況。講城市講文學可以舉龐德的一首詩，1910年龐德在在法國的協和廣場地鐵站，在人群擾攘中，在非常擁擠昏暗的地鐵站裏，他看到了幾張美婦人的臉，非常漂亮的女子，還看到了小孩很純真的臉，於是他在地鐵站裏寫了這樣一首詩。原來寫了三四行，後來就修改成十五行，最後變成兩行，是意象主義的代表作品，那兩行大約是說：「幻影般乍現的人群中的幾張臉，像濕黑

陳義芝先生

枝頭上的幾瓣花。」這個是文學的巴黎，這個是那幾張臉就像那幾瓣花一樣的，拐惑了龐德的心，所以那個是龐德想像中的城市，我覺得這一首詩可以拿來做今天主題的說明。也就是說在文學裏具有想像力空間，既來自於城市，但是，它必須是創造為另外的一個心靈的居所，它不是城市裏邊那種地理的景象，而是心靈的景象。

我們知道文學有兩種狀況，一個是空間的直述，一個是時間的直述，如果談城市的話，當然城市的那種日新月異的建築美學，的確可讓作家讓詩人作為取材的對象。但是另外一個城市的異文化的直述，大概就是有不斷展演的活動、表演藝術，來自於世界各國的藝術活動，這個東西會刺激文學，好像帶來很多禮物給人，給住在這個城市的人，作為創作取之不盡的材料。

另外，文學的一個直述，就是時間的直述，時間的直述在城市裏面感觸最深的就是那一種滄桑的情懷。因為在鄉下常常是幾十年不變，剛剛白老師講的那個斷背山的地方，那個可能永遠是同一個景象，但是在城市裏面變化很大。我這一次來距離我上一次來已經是1997，十年了，香港對我已經很陌生了，要經過了兩三天終於才把我從前對香港的坐標印象定下來。

我講的就是說城市裏邊，雖然不斷的一直在更新，在變動中，像台北，在一些高樓之中有時候還保留了一

些小的巷道，還有一些準備要拆但還沒拆的房子，這些都提挈了一些廢墟一般的美學，我覺得這個是文學非常特別、吸引人的一個部份。我曾經在1999年搬了一次家，在台北市寫了一首詩叫〈一所房屋的廣告詞〉表面上好像是為了我的居所的美好作出讚美一樣，我說你每天走快速道路二十分鐘就回到家，住更遠的人只好在車鎮裏或在高速公路上，你慶幸住在這裏，不在煙水的市鎮，土石流的山村，住在這裏不在群眾霸佔的廣場旁。然後底下就講到我住的地方，燈光怎樣像星光，然後說風輕輕地在吹向，像神在彈着琴等等，但是最後呢？其實這些都是我心目中的景象，心目中的幻想，真實的情況是甚麼呢？我說這是你住的屋子呀？住進來就不捨得搬離的地方，每個人都該擁有的居所，你問他卻在何方？其實是替現代城市人發出一個問句，就是說這樣不斷的物價上漲，然後房價上漲，作為一個小老百姓，其實是有莫大的壓力，莫大的惶恐，這是回應了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所以城市儘管一直在變遷，但是文學的心靈，有時候它的關懷是不變的，今天就報告到這裏。

吳：剛剛我一開頭講的話要修正一下，有人以為寫新詩的人都是把散文分成幾行，一句簡單的話寫得不明不白。意思也就是說新詩人很多寫的都是看不懂，非常困澀，而且虛無飄渺，但是各位聽聽剛才鄭教授也

好，陳教授也好，兩個人都有實際作品作例證，非常的實在，一點都不空虛，都不虛幻的。

底下是葉輝先生，他在香港也是非常著名的編輯，各位知道《明報》也好、《成報》也好，他都曾負責很多年的實際編務，而且他也參與香港各大學詩歌比賽的評審等等，非常有經驗。最難得的是去年他負責評審我們城市文學獎的時候非常的認真，各方面也好，寫評審也好，我都覺得他非常負責，非常認真，非常佩服他。現在就請葉輝先生講話。

如果懷念是源於毀滅

葉：這次題目是城市的變遷，前面都有不少的前輩都談到香港這個城市的變化的感受，白先勇教授1950年來香港的時候，我還沒出生。劉紹銘教授作為一個文學青年發表作品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學生，我沒有更好的資格來講香港的變化。唯一的，我是一個離不開香港的香港仔，我一生離開香港最長的時間，包括移民也不超過三個月，

葉輝先生

我就馬上要回來了。一個土長的香港仔，在年紀上、在年資上，不算是一個很合適說香港變化的一個人。但是，我在香港生活了整整超過半個世紀，沒有離開過。我就想從我自己親眼看見的香港城市變化的兩個故事說起。

第一個是我最近才發覺的，我在1968年，在尖沙咀一個酒吧做了三個多月的暑期工，那條街叫「康和里」，一個非常中國化的名字，其實，它是英國地方名的翻譯。對面有一條叫棉登徑，另外隔壁有一個叫緬甸臺，他們都是一個英文名。英國人把尖沙咀幾條小街道改成為英國人地方的名字，這樣就讓他們在香港去撫慰他們的鄉愁。在「康和里」裏面有兩個酒吧叫Good Luck Cafe，是給美國人水兵打越戰回到香港度假的人去逛的一個地方，播的都是英美的流行歌曲。隔壁有一個酒吧是清吧，後來我才知道所謂清吧就是基吧，有很多英國人、澳大利亞人，外國人流連的場所，全男的。那酒吧的名字是澳大利亞的國歌。我在那個地方工作了三個多月，每天都聽不同的歌，Good Luck Cafe 播的歐美流行歌曲，外國人唱的民歌，每天我都在那種環境裏面生活。大概是今年的年頭一月份，每一次經過尖沙咀康和里的附近，我都回去看看，發覺已經找不到那條街了，好像不知道那個地方在甚麼地方，我就拐了一個大圈。後來我發覺那條存在了好幾十年，起碼有一百多年的老街已經不在這個

世上了。碼頭可以拆掉，房子可以拆掉，一條活了差不多一百年的一條街消失於無形之中，後來我才知道有一個很大的商場、酒店的大地盤重建的項目裏，就把兩條街都封掉，這條「康和里」就永遠消失在那個地盤裏面，它建成以後就變成為大酒店、商場的一部份。

一條街不見了讓我想起童年成長的一條街也不見了，在我記憶裏面，1957年我唸小學的時候，我爸爸帶我去買書包，買燒豬拜神，要拜文曲星。我們經過一個店，那個小店是賣鏡子的，我就和爸爸從幾百個鏡子前面走過，我跟我爸爸的影子在鏡子裏經過。很多年以後，我住的那個地方叫馬山村。很多年之後，一九八幾年我就帶我的兒子走到那個地方，我想告訴他，你爸爸以前童年的時候就是住在那個地方，我跟我的孩子也經過了那個鏡子的店舖，我們的影子也在店舖的鏡子裏反射過來，但是我們去找馬山村的時候，原來馬山村已經不存在了。不只是馬山村不存在，連同我童年時代，從一條村走到另外一條村，總共十三條村，都已經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沒有了，都夷平了，整個山頭都沒有了。

現在變成為一個屋苑，樓高四、五十層，比從前的小山還要高，但是，再找不到童年走過的一條山村了。

昨天，馬家輝送章大姐回到太古城，章大姐住在太古城，我們就找了一個大圈，我就想起童年的時候自己在那個地方玩、長大的。那是一個很大的船塢，船塢

就是大船廠，叫太古。它本來是一個海旁，海旁旁邊是一個大碼頭，碼頭就是修船的，現在變成為太古城了。是從沒有的一個地方變成為有的，本來是一個海旁，現在變成為一個城了；本來是一條街，現在沒有了；本來是一條山村，現在被夷為平地了。

最近兩年我去旅行，一處是柬埔寨的吳哥，一處是緬甸。這兩個地方以前都是古城，現在已經變成讓人憑弔的廢墟。如果我們對於一個城市的懷念就是由於它的毀滅，由於它的消失了，我自己覺得這樣的一個變遷實在是太悲痛的一個變遷。如果好像一個廢墟一樣保留着從前七百年前、一千年前那樣不變的話，也不是我們這些在城市長大的人可以想像的一種不變。那種就是永久不變，好像再沒有活力，如果只憑歷史的懷想才存在的不變的話，兩者之間我們選哪一種呢？對我來說，是一種很難的取捨吧！我們只能夠在變與不變之中找我們要寫的東西靈感的來源，有時候是變、有時候不變，變的時候我們懷念，不變的時候我們懷疑，而中間給人一種不存在的那種感覺。時間的不存在跟時間的變遷太急、太快、太大的話，我們承受不了。城市的變遷對我來說就是變與不變之間的那種思辨的關係，到目前為止也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謝謝大家。

凱：謝謝葉輝先生，我們下面是請痙弦先生跟我們講一講他創作的經驗，他對於整個編輯、副刊，提倡文藝寫

作對於整個台灣文藝發展的一些心得。我想大家都應該知道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詩人，而且朋友經常講他是一個奇蹟。因為他寫詩寫到高峰的時候，每一首詩出來都是大家傳閱的，後來突然不寫了，而且本事很大，放下筆不寫詩一放就是四十年，你問他，他說你等着我，我還會寫，所以我們還在等呢。他形容自己是睡火山，就是他睡在那兒，他哪一天就爆發了，所以說不定他今天跟我們講了以後，他回家晚上一高興睡了一覺，明天他這個火山就爆發了。請瘂弦先生。

城市隱藏鄉村

瘂：我非常謝謝浸會大學給我這個機會在香港住下來，住三個月，大街小巷已經跑遍了，每天早晨四點鐘，我有時候睡得早就到聯合公園去聽鳥叫，這個鳥兒我發現很多，而且每一種鳥固定的住在一起，不是混在一起的。可是每一種鳥對於早晨到來的定義都不一樣，四點鐘的時候，鳥也在叫。有一種「吱吱喳喳」地在叫，其他鳥都不響應，

瘂弦先生

急甚麼？還早着呢的意思。嘿，叫一陣子不叫了，等一下另外一棵樹上的一種鳥又開始叫，剛剛叫的鳥也不理牠們，就這樣好幾窩的。然後一直到大家都公認早晨來了，就所有鳥都叫了，太陽出來了。

我第一次聽到杜鵑的聲音是在香港，最近杜鵑的聲音沒有了，有一陣子我剛來香港的時候，杜鵑聲音叫得特別大，而且悲慘，可是我想到雪萊的雲鵲，意思是你不是個鳥而你是個人，聽到杜鵑的時候真的覺得「望帝春心託杜鵑」，它是個人的呼喚、人的嘆息。我第一次看見洋紫荊就覺得非常美，它不是單調的粉紅，粉紅的花蕊上還有很多紅的線，向外放射，這是香港的市花。香港叫木棉為英雄樹，我覺得這個名字非常的好，所以我覺得香港雖然是一個都市，但它裏邊兒還隱藏着鄉村在那裏，所以我覺得一個好的都市應該在他的裏頭隱藏着鄉村。人們喜歡巴黎是因巴黎悠閒，悠閒這是因為有鄉村性格在裏面的原因。早年大家喜歡北京，提着鳥籠子趕集等等，大家迷得不得了，這是因為它的鄉村性格。剛剛葉輝先生說很多東西消失了，好多老建築摧毀了，整條街都不見了。但是，我覺得不知道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香港是比其他都市保留更多農業的氣質，譬如說香港還有很多廟宇，我就到天后宮去，看到那些打拳的、算命的、練嗓子的都還在那裏。我也到摩羅街去，那邊古董攤子很迷人，也有幾家老書店可以看到三、四十年老版本

的書，我去了，他們說董橋先生前幾天也來過，都是非常迷人的，很鄉村化的，所以我覺得理想的都市最好跟鄉村的文化能夠結合在一起。你說這香港多有意思，你要它多洋它有多洋；它洋中有土，你要它多土，它有多土。你看幾十層高樓的下面，近門兒地方一定有個小小的、不高的小神台，有時候是一個小神像，土地公在那裏。它智慧型的大廈，幾十層的樓還不會忘記那個土地公，這很有意思，台灣就不太見到這情況。那麼，寫婚喪喜慶還是老規矩，雖然是白紗的新娘子，但到了晚上吃飯的時候，還是穿着紅褂子，是那些典章制度也好，繁文縟節也好，大家還是照着古老的儀式來進行，這在其他都市不太看得到了，只有香港才看得到。早年的香港，維多利亞港那邊還有婚船，現在婚船少見了。夏天的時候老太太還穿着星雲紗，香港結婚的時候，那些非常巨大的喜牌、花環，還是掛在最高的樓上，所以說香港的老東西還在，他有意無意地保存下來，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可貴的。雖然他是世界名城，他有很強的都市性格，但是他還沒忘記農業氣質，就是把最洋的、最土的加以結合，使他產生非常好的文化。很多的建築，前面都用石頭刻着，裏面用的文字都非常的古雅，有些字我都不認識。雖然香港的公文都是英文，但是這些地方都是按照老規矩來。我收到的好幾張開會通知，用的語言都是非常老實的，我覺得我們中國人留下的東西

不多了，能夠把這些維持是很好很好的。怎麼樣能夠把這一種結合並行不悖？能夠把它作為特別的一種典型？那作家、詩人也可以就着這種結合寫出新的東西來，我覺得這一點是因為在香港的觀察可以得到的啟發，香港人都做到了。你到了聯合道、廣播道都可以看到。另外你可以說這個流行歌曲是很都市化的，但是香港的流行歌曲，像黃霑他們的歌曲呀，有新的味道在裏面。不是早年的那種郎呀郎呀妹呀妹呀，不是上海式的。它有一種新的味道，《上海灘》都是像有一種丈夫氣概的，用英雄主義，或者他們叫新古典主義這種味道，我覺得是非常迷人的。這種好像宋詞一樣，宋詞本來就是軟綿綿的嘛，都是茶館兒、酒榭兒在那裏，歌女在唱的嘛。但是蘇東坡一出來以後就不一樣了，他把剛健的、悲涼的人生、人性統統表面出來，如「大江東去，浪淘盡」整個情況不一樣了。香港這個都市，它有很多新的璀璨，很饒然的，跟古典的混合在一起，這一點是我非常喜歡的。我的第一本書在香港出版的，現在又到了香港已經一個多月了，我覺得我已經是個香港人了，謝謝各位。

凱：謝謝瘂弦。我們現在請鍾玲教授。鍾玲教授也是詩人、也是散文家、也是小說家，所以我想她一定有很精彩的發言，可我不曉得她會講哪一個領域，不過沒有關係，反正大家對文學有興趣，天馬行空，講到哪裏都可以，一定都很美的。鍾玲教授。

被大自然包圍着

鍾玲教授

鍾：謝謝鄭培凱教授，先講題目「城市變遷與文學之路」，然後我就回想一下我寫過甚麼東西是跟這有關係的。我想到了，有一首詩，那首詩是1980年代寫的，那個時候我原來是住在沙田，後來就搬去港島。原來住沙田的時候，沙田在 1979 年， 1980 年初我還住在平房，隔壁住的是喬宏，還養了四隻大狼狗，你可以想像那個空間是怎麼樣的。沙田沒有甚麼高樓大廈，後來我搬去香港以後，隔了幾年吧，有一天晚上要去中文大學參加一個學術的活動，我就載了幾個朋友，我記得是包括張漢良，是我開車，就晚上。黑夜穿過獅子山隧道，然後開出去，我嚇了一跳，忽然路兩邊應該都是黑的，就出現了高樓大廈，因為沙田的商業區跟住宅區就在幾年之中起好了。我的感覺不是在開車，我的感覺在開太空船，所以我就寫了一首詩講這個感覺。這首詩應該是扣着題目「城市變遷與文學」，那我又在想，其實我的作品裏很少寫像葉輝寫的東西，對城市，住在

其中哪一條路、哪些建築的那種感覺，那種依戀，我寫得很少。我的小說如果有寫就是一個背景一個襯托，那我想為甚麼我會這個樣子，為甚麼我跟城市有一個距離，我想到大概是因為有某種程度的「密室恐懼症」，這種恐懼症在香港發作得更厲害了，因為香港房間都比較小，住的地方也比較小，你想想看那麼多層樓那麼多人疊在你的上面。去到旺角好像要衝鋒陷陣一樣才能夠走幾步路，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就很喜歡到香港周圍的山裏頭去，去爬山，但是我個人又膽子小，不敢一個人去，所以通常都是跟着我們的領導鄭培凱和副領導家祺一隊人馬，差不多香港重要的山我都走過了，所以這是我第二個要感謝鄭培凱的原因。

回過頭來講城市，我們口中所講的香港，很多人以為是港島裏頭的中環、銅鑼灣、九龍、尖沙咀，其實「香港」這兩個字，包括整個區、包括外面的大山、還有很多島。香港其實是一個被大自然包圍的市中心，這個才是真正的香港。在香港裏也有高樓大廈的城市，也有周圍的大自然。我就記得我們每一個禮拜的爬山，都是先去大自然裏，去爬三、四個小時的山，有些還蠻難爬的，我是被他們有一點半騙半帶的上了獅子山頂。可是爬完山下來去吃一頓好的，那個甚麼土耳其的 restaurant、泰國的 restaurant，就是鄭培凱知道哪些地方是好吃的，所以又回到城市、回到高樓大廈裏來了，這兩者之間是優游自在的往還，所以我

覺得這一面的香港生活我自己是非常的欣賞的。另一方面我要感謝城市大學，我還記得去年國際作家工作坊一共請了八位作家，包括愛爾蘭、紐西蘭的作家，我們的主題是「大自然寫作」，那時候我糟了，我還要帶這些作家去參觀大自然，我是很差的領隊，坐甚麼車去都不會。所以只好求救於鄭培凱，他就幫我們安排了西貢的西灣，走了四個半小時，經過鹽田仔、大浪灣，最後去西貢吃海鮮，所以這是我第三次要感謝鄭培凱的。報告完畢。

凱：哈哈，好像跟我宣傳甚麼，我又不是導遊。現在我們跟各位嘉賓都已經發言完畢，我們還有一點時間，我想只要我們稍微延一下，差不多有十分鐘左右，我想開放給大家發問。對於自己心儀的作家都有一個想法，或者是有一些問題想要問，特別是董橋先生，他說你問一句我答一句，你問十句我答十句，所以雖然他沒有發言，但他開放給大家發問，我想把這個時間開放給大家，有甚麼問題，有甚麼感想，還有你心儀的作家，你想講的話，現在可以發言。

「雖九死其猶未悔」

問：你好，我想請問一下章詒和老師最近你的情況怎麼樣？香港挺多人關心你禁書的事情。

章：謝謝，我會堅持到底，回去就要打官司。在這個問題

座談會台上台下

上，我覺得已經不是為了一本書或者說不是為了八本書，我覺得這是牽涉到一個中國公民基本權利的問題，而且這種狀態持續有半個世紀了。所以我們需要作努力，查禁是可以的，但是查禁應該合乎法制，中國必須要走這個法制化的道路。所以不僅是我一個人，而且有很多人都在這樣做，我只不過是比較早地站起來，可能大家也知道最近戴煌先生，他已經向法院起訴了，關於新聞署撤銷他的《九死一生》，在中國作家出版社的出版起訴書，現在被駁回準備上訴，他已經是近90歲的老人，但是鬥志昂揚，因為我覺得正義在我們這一邊，道理在我們這一邊，所以我們需要去努力，而且我覺得在中國大陸沒有甚麼人施捨你，所有的權利都要靠自己去爭取，謝謝。

問：董橋先生，第一個問題是馬家輝的專欄裏面寫：董橋說，他的散文改七次八次才見報。兩個問題：有沒有試過呢，不經修改就登出來了？第一個問題。第二，改了八次以後呀，見報了以後，會不會後悔還是要改？

董：還沒有試過沒有改的散文就發表，我沒有試過，都是看過改過的，改了那麼多次之後，發表之後，我都不敢再看了，再看的話還是要改的，謝謝。

問：董橋先生，聽說一個專業的作家變成一個CEO，對你的文學之路有甚麼影響？

董：很大的幫助，因為文學通常被人家的感覺是風花雪月，不太能夠腳踏實地。而做報紙呢？就剛好讓我每天跟全世界的新聞接觸得非常頻密，所以我看對我的寫作幫助很大。起碼對我個人，人生觀也好，看書那種感覺也好，完全會為了每天看到世界各地那麼多新聞，而有一種不一樣的感覺，那寫作的人是需要這種東西的，我想。幾十歲的人再風花雪月不太好了吧？哈，不過你說不要我風花雪月也很難，因為天生就是風花雪月。這個就很難再改變了，我也不太想去改變。也就是說每天接觸新聞很多，那種感覺是很好的，非常好的。

問：大家好，我想問一問章詒和教授，我們也看了很多你寫以前戲劇老前輩的一些往事，我想問一下為甚麼你對這些這麼有興趣和寫他們的故事呢？謝謝。

章：這是我的專業，我的專業持續了四十年，所以我寫他們應該是專業的事。第二個，我大部份人都認識，他們和我的家庭、和我本人都有直接的關係，我很少寫我不認識的人，因為我覺得你認識和你不認識的寫出來的東西是兩樣的。第三個就是藝人是一個最脆弱的群體，又是一個最獨特的群體。他們有個人命運，但是他們的個人命運非常能折射出時代，非常能看出社會，無論社會的優與劣，左和右。這一群人，伶人都是生活在患難之紀，我說的患難之紀，它的前期是在國民黨之爭時期，49年之後，他們活在共產黨之爭時期，這個命運的劇變，而且他們年齡也是從年輕到死。還有他們的藝途是從紅到黑，所以我在想，沒有任何一個群體像他們那麼美麗，也沒有任何一個群體像他們那麼神秘，演員是需要神秘感的，所以我是比較反對某些非常走紅的演員頻頻去曝光，因為這對他的藝術是非常不利的。你看，梅先生，你到他家裏去，只要他下得樓來，一定是頭髮鋥亮，然後皮鞋鋥光，絕對是這樣的。再熟悉他的人，包括他的兒媳婦在內沒有見過梅蘭芳穿着拖鞋弄着睡衣就下樓的，這個都是很不容易的，為甚麼呢？他是一個徹底以美為上，所以他在家裏也是這樣。可能大家也會知道他的死，在醫院，如果說梅先生肯用床上的「坐便器」，梅蘭芳是不會死的，但是他不願讓人家看見他的肉體，所以他執意要一個人去廁所，所以梅蘭芳是死在

廁所上。他為美而生，為美而亡，這是一個讓你動心、讓你痛心的這樣一個人。我想你們在座的每一位青年，如果能和這樣的人相識的話，你們也都會寫他，太有吸引力了。他們遠比政治家有魅力。謝謝。

問：我也特別愛看，我覺得看章先生您的書是一種享受，也是一種驕傲，這是我自己的一種體會，我想問問就是章先生您最近還有甚麼打算？還有寫哪一方面的內容？

章：今年是07，是一個整數。我的同事叫摩羅，寫過一篇文章，是十年前寫的。叫〈四十年無祭，四十年無思，四十年無恥〉，我非常欣賞。我為我有這樣一個年青的同事而倍感自豪。我會寫為五十年無祭而祭，我今年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會圍繞着這樣一個主題，這不是為了一個叫章伯鈞的人。謝謝。

凱：我想問底下還有沒有人有問題，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我想我們今天早上的這一場座談會就到此結束。我想我們今天早上非常愉快，而且非常順利地進行到這裏，也注意有些作家講得也非常感動。剛才聽了章大姐講到梅蘭芳為美而死，我覺得淚水已經盈了眼眶，因為一個人的追求，假如他認為他一生的最執著的追求是甚麼，他是生死都交給那一個追求，這就是藝術家、作家、詩人、散文、小說家追求的最高境界。非常謝謝大家，也謝謝我們的嘉賓作今天上午的座談，那我們下午再見，謝謝大家。